

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历史机遇

思想人生⑧

我从事经济学研究近半个世纪。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发生巨大变迁,中国经济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命运相连,切身感受到个人微薄贡献与民族进步的关联,并能不断增强个人观察、探索、思考能力,是一种人生幸运。

我30多岁才走上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道路。但在此之前,由于时代变迁,我先后到煤矿、部队、工厂和政府机关等多个岗位磨练,得到思想“启蒙”。在部队期间,我所在的部队首长们特别允许我可以随意阅读让我保管的各类封存书籍。在这一时期,我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等,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了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道理。这对我此后选择攻读和研究经济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段经历相当于我的“大学预科”阶段,受益终身。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和经济学硕士学位。在南京大学担任两年讲师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从事实际工作部门转向经济学研究领域所受到的系统专业教育,这一时期正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时期。从此,从事经济学研究成为我的终身志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大背景。正是在这一时期,我有幸进入经济学的学术殿堂和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处于经济改革理论探索的最前沿,国家的一些重大改革方案,都有社科院的学者参与调查研究和理论探索,科研工作具有很大的探索性,也与改革开放的实践需求紧密相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学研究,如鱼得水,可以在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尽情驰骋。我在中国社科院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继续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作为主要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我始终认为,将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解释和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科学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价值,应是治学的方向。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产业(工业)经济学。工业化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工业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大胆、最彻底的领域,是中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话语权增强的现实基础。我组织工经所的研究人员,完成了国内第一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新编工业经济学》,此书被认为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长期作为研究生教材和重要参考书。

数字化改革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贺信时指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浙江要抢抓机遇、抢占高地,走出一条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其中,数字化改革是推动职业教育适应新时代新业态的关键一环,要以数字化改革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聚“合力”,构建数字化改革助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话语体系。数字化改革是浙江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走在前列,奋力打造展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重要窗口”的重要支撑。无论是夯实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学历制改革,还是大力发展本科职业教育,数字化改革都是其中服务终身教育、就业教育,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全省职业教育大会提出的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包括了育人体系、办学体系、发展体系、服务体系、教学体系等5个体系,其中统筹

金 砥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发展不再由计划安排,而是取决于其国际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致力于产业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研究。1995年至1997年,我主持承担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其总报告获得1998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出版的学术专著《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1994年出版的《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2022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丛书,预计下半年再版发行。这表明30年前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践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今天仍能展现其学术价值。

与中国工业化直接相关,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自然成为我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我提出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的代表性理论,即“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核心观点有: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优缺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但绝不是普遍地适用于大多数企业的企业组织形式。这一理论探讨受到实际经济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广泛重视。

三

长期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使我越来越深切感受到,经济学本身必须不断进行重大创新,才能适应于新的时代。在我看来,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叫作“思想解放”:不仅是解放别人的思想,而且首先是解放自己的思想,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重新学习经济学,并把自己才掌握不久的经济学知识运用于解释社会现实,从而为改革开放注入经济学的逻辑和思维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1984-1986),我就开始研究和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到本世纪初,我们看到并越来越深切感受到,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产生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此时,深刻反思得失并进一步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道路,成为必须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产业及工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区域空间中实现的,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资源环境观,较早地开始了新型工业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探索。从1996年开始,我组织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专家团队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合作,进行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另外,还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威尼斯国际大学等合作,开办了“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邀请各国专家在中国北京和意大利威尼斯两地授课,并每年分4批。

通过过去发展经验、发展理念的及时总结与反思,我们在中国经济尚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就前瞻性引入了生态环保观念,较早地开始了新型工业化、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等方面的探索。从1996年开始,我组织中国社科院各研究所专家团队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合作,进行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另外,还同意大利领土与环境部、威尼斯国际大学等合作,开办了“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邀请各国专家在中国北京和意大利威尼斯两地授课,并每年分4批。

四

连续10年组织选派全国专家、政府官员以及企业高层管理者赴意大利学习考察。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多年致力于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转型升级、民生经济学问题等,都与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从主要关注“量”的研究,进一步向经济的“质态”领域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再探索的新方向。

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必须向着更能体现人类深层理性的方向发展才能不断提升文明水平。经济现代化的理论研究,需要不断深化,并形成更符合人类本真价值的社会文化和制度形态,实现个体理性与社会合作的良性互动。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深层逻辑基础。

四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学界拒绝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而引入了经济学两大理论范式:即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逻辑构建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的新形势,各高校都积极编写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担任主编,试图另辟蹊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衔接,创造一本具有全新理论框架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高校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当时负责《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编辑就策划组织对该书作学术性评论,而且希望体现“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在胡乃武教授推荐和导师吴树青教授的鼓励下,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读博士的我撰写了一篇题为《探索中的进展与困难》的学术探讨性书评,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新华文摘》1988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

后来我去厉以宁教授家中请教,没想到厉教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还对我说:“书评写得不错,提出的问题也很好很尖锐,但这些问题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恐怕是解决不了了,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可以继续探索。”正是如厉教授这样具有广阔学术胸怀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强烈使命感的中国经济学者,推动着中国的经济学理论进步。

从科学史的规律来看,范式变革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重要历史使命。过去,经济学发展一直由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迄今为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仍然是一个学术高地。

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既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那么就只能别无选择地引入“微观—宏观”范式,作为市场经济研究的主流范式和学术体系基础。而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学发展又一次处在能否实现新升华的路口。

经济学的发展曾经从史观范式主导,转变为“微观—宏观”范式主导。“微观—宏观”范式承诺,尽管严谨、精致、更具有逻辑自洽性,但所刻画的不过是一

个抽象的幻象世界。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现实经济行为并非基于抽象人性的“微观—宏观”现象。因而,如果能将史观范式与“微观—宏观”范式相衔接融通,就会形成“史观—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的思维框架,使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进行范式变革,创造新的学术进步路线,可以开拓经济学发展的广阔“蓝海”。

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和现代经济学的引入,在中国深厚国情文化和现实经济基础上,会形成中国经济学思维的范式倾向。今天正当其时:中国崛起,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地位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正在产生巨大的动能,改变世界格局。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迎来重大机遇。

进入21世纪,我的研究重点开始集中于经济学范式转变的探索。我致力于推动经济学范式变革向“域观”范式演进,发表了诸多学术论文,出版了《域观经济学研究》一书。我发起建立的“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多次进行了研讨。我和几位担任博士生导师的经济学家合作,计划出版域观经济学的系统理论论,以期进入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正如一位哲人所言:“研究是最高之善。”年逾七十的我,经济学研究至今仍然是投入精力最多的活动,我每年都要应期刊约稿发表一二十篇学术文章,每一两年出版一部经济学著作。这几乎成为我的养生健脑秘诀:把研究和写作作为习惯,保持思想的清醒和敏捷,是为思想人生。

名家小传



金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China Economist》期刊创办人。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工程”著作奖、中国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20多项国家级或部级优秀成果奖。发表学术论文500多篇和《竞争力经济学》《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域观经济学研究》等学术专著40余部。



扫一扫 看视频

实践探索

系统思维是指人们运用系统观点,把对象互相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整体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今年年初,省委主要领导在杭州调研亚运会亚残运会场馆建设及赛事保障工作时明确提出:“明晰顶层设计,做好任务分解,实现各项工作细化量化闭环,全方位做好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各项筹备工作。”运用系统思维统筹谋划,有序推进全要素参与、全流程演练的系列测试赛,对于亚运会亚残运会的成功举办具有积极作用。

运用系统思维,以大局观守牢安全底线。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举办大型赛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环节多个领域,任何一个领域所发生的风险都有可能影响比赛的全局。因此,要运用系统思维,以全局的眼光看待赛事举办,进行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以系统工程的方法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2022年9月,“韵味杭州”2022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杭州举行。本次比赛是在疫情常态化化管理下举办的一次对社会公众开放的水平高、规格高、规模大的比赛,健全风险防控体系是举办本次大赛的安全底线。一方面,要立足当下,统筹协调各方面,解决现实问题。具体来说,承办机构严格对照亚运办赛要求,统筹谋划,围绕吃、住、行、赛四个方面,推进竞赛组织、安全保障、疫情防控、舆论宣传、赛事转播以及后勤保障等不同领域实现体系贯通、跨领域协同。在疫情防控上,深刻把握相关精神,结合属地要求,采取外来人员落地核酸检测、运动员和技术官员相对独立管理、根据场馆容量尽可能对观众开放售票等举措。另一方面,要着眼顶层设计,完善体制机制,做到“防患于未然”。具体来说,黄龙体育中心在比赛期间着力完善赛事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分层分级,严密构建风险防控闭环。建立赛事风险清单和风险等级四色表,制定完善赛事风险处置预案,形成赛事风险“检测—跟踪—处置”工作闭环。部门联动,筑牢赛事风险防控屏障。与属地公安、消防、电力、食药监等多个职能部门协同作战,全面摸排管控安保、供电、消防、网络信息、食品安全等方面风险。预案演练,迅速控制健康码变码风险。针对因省外疫情导致健康码变码等情况,第一时间启动风险预案,及时与属地和上级部门协调,通过赛时转码应急通道,实现黄码人员在较短时间内转为绿码,确保比赛安全有序进行。

运用系统思维,以协调意识凝聚合力。系统思维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平衡性等思维特征,要求在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层次、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事物、把握规律,进而从总体上实现事物结构和功能的优化,在多目标推进中实现动态平衡。大型赛事是一个普遍联系、多维多元的复杂系统,各项工作、各类要素相互交织。在比赛举办过程中,要把握好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要素优势,形成1+1>2的合力。一方面,实现“竞委会”与“场馆化”模式的有机融合,探索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的成功经验。“竞委会”与“场馆化”都是大型比赛常用的赛事运行和管理模式,各有利弊,本次锦标赛将两种模式有机结合,创新了办赛机制。在赛前筹备阶段,充分发挥“场馆化”模式的统筹作用,通过周例会、指挥长协调会等形式,明确各领域运行流程,并认真推进物资就位、人员培训和临设景观布置等关键节点任务,把控整体筹备节奏。在赛中阶段,明确竞赛的核心地位,建立指挥长领导下的赛事综合运行体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新闻宣传、电视转播等在赛事宣传上的积极作用。新闻宣传和电视转播是整个赛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次比赛整合报纸、电视、网络新媒体、城市大屏等各类资源,低成本全方位开展宣传服务。创新赛时志愿者通讯员机制,充分发挥青年大学生在新媒体和自媒体时代的宣传优势,开展针对青少年人群的定向宣传。在户外大屏和地铁电视进行赛事播放测试。把握和引导舆论宣传,着力推动“奥运冠军进校园”等热门公益活动。

【作者为杭州亚组委黄龙场馆群媒体副指挥长,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

之江青年论坛

变革重塑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

潘建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浙江作为民营经济大省,要以变革力量系统性重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推动转型升级再跨越,创新发展再突破、发展优势再增强,加快实现新时代民营经济新飞跃。

以产业变革夯实民营经济发展根基。浙江要锚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方向,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显现新成效,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具体是加快推动“五大转型”:一是数字化转型。突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二是服务业转型。强化工业设计赋能,加快服务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迈向服务型制造。三是集群化转型。加快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催生形成一批高成长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星”产业集群。四是绿色化转型。推进低碳转型,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一批绿色低碳工厂、绿色低碳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五是产业链转型。聚焦标志性产业链,组建产业创新联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体,打造更具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链。

以科技变革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科技投入是最“昂贵”的投入,更是“最值得”的投入,要持续做好科技变革“四篇文章”:一是做强科技创新“主平台”。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做强以城西科创大走廊为主体的科创走廊体系,做优以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为龙头的新型实验室体系。二是壮大科技创新“主力军”。壮大科技型产业集群,培育技术创新示范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业化“小巨人”。三是释放科技创新“驱动力”。加快创新链产

业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经济建设主战场。四是强化科技创新“硬支撑”。精准招引“高精尖缺”人才,在重大创新实践中培养、造就和集聚人才。

以市场变革拓宽民营经济发展路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企业要聚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新一轮需求培育消费市场:一是“新动向”。把握“新基建”等市场动向和需求特点,抓住未来工厂、“虚拟”产业集群等发展方向。二是“新产业”。谋划新能源、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做强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推动“风口”产业与现有产业有机融合。三是“新模式”。推广“互联网+服务”新模式,引导企业发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开辟网络直播、跨境电商等新模式。四是“新领域”。引导企业切入数字经济、制造加工等细分领域,成长为产业链、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

以环境变革重塑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环境是最大的公共产品,也是增强企业信心的最强保障,要着力打造“四大环境”:一是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落实好对企业纾困帮扶的同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为民营企业营造公平透明的发展环境。二是依法办事的法治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确保市场和政府边界清晰、企业与政府行为规范。三是高效精准的供给环境。争取杭州宁波温州申报全国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试点机会,推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优化配置,依据市场规则、价格、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四是循环畅通的开放环境。提升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带动产品和服务输出,推动我省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作者为省委党校进修三班学员】